

哲学人类学视域下后人类时代技术、文化与人的存在方式研究

顾金桐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 中国·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本文立足哲学人类学理论视角, 围绕后人类时代技术、文化与人的存在方式展开系统性研究。文章首先梳理马克思·舍勒、普莱斯纳、盖伦奠定的现代哲学人类学思想谱系, 提炼“人的存在未完成性”核心命题, 并阐释该理论体系对接后人类议题的内在理论通路; 其次剖析后人类时代生物技术、数字算法、元宇宙等技术变革从生物身体、文化生产、身份认同、传播机制多维度重构人的存在形态, 继而从存在论、协同进化、日常生活三重维度溯源人与技术、文化本性共生关系, 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所呈现出的混合化新特征及潜在异化风险; 最后, 文章强调应超越盲目拒斥技术的传统人本主义与消解人主体性的技术决定论, 回归人、技术与文化本性共生的存在论根基, 以文化的价值理性引领技术发展, 建构和谐共生的后人类存在新格局, 从而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守护人类的主体性地位。

关键词: 哲学人类学; 后人类时代; 人的存在方式; 技术; 文化

Research on Technology, Culture, and Human Modes of Existence in the Post-Human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Gu Jintong

School of Ethnology,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culture, and human modes of existence in the post-human era. First, it traces the moder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thought lineage established by Max Scheler, Helmuth Plessner, and Günther Anders, extracting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the incompletenes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explains how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connects to post-human issues. Next, it analyzes how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the post-human era—like biotechnology, digital algorithms, and the metaverse—reconstruct human existence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biological body, cultural production,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It then investigates the original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from ontological, co-evolutionary, and everyday life perspectives, revealing new hybrid feature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potential risks of alienation.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mov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humanism that blindly rejects technology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at dissolves human subjectivity, returning to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guid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rational values of culture,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post-human mode of existence, thereby protecting human subjectivity amid wav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Keyword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Post-human era; Human modes of existence; Technology; Culture

0 引言

后人类主义作为 21 世纪科技人文的新兴理论, 一方面呈现了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快速发展时代对传统人文主义主体观念的质询与拓展。自从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来, 人类就被赋予了一种终极价值或特殊地位, 这种价值认知最终发展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中心主义, 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着主导性的观念地位。换言之, 所谓

“后人类时代”是指传统以理性主体、自主意识和自然身体为核心的人类存在模式正经历深刻的变革。哲学人类学, 作为一门旨在系统性地探问“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位置何在”的哲学分支, 其思想谱系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回应时代变迁与知识挑战的历史。正如舍勒认为, “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实存类型转变或‘人的观念’……的转变现代性标明的不仅是政治秩序、经济制度或知识体系

的转变,更是人自身的转变”^[1]。当今,随着技术的深度嵌入,使得人与机器、现实与虚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传统人文主义建立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哲学以及经典人性观遭遇重新审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更深刻介入人的身体结构、认知方式、情感机制和社会关系,使人的存在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混合化等新的特征。此外,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也在技术革新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变迁。

1 哲学人类学的思想谱系及其后人类转向

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发源可追溯至德国思想界,马克思·舍勒、赫尔穆特·普莱斯纳与阿诺德·盖伦等人共同奠定了其理论基石。三者研究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确立了“人的存在的未完成性”这一核心命题。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中提出,人是“生命与精神的二元统一体”。与动物被本能封闭于特定环境不同,人凭借精神能力打破了生命本能的束缚,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精神使人超越自身的生命存在,追问价值与终极意义,这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根本特质。在舍勒的理论中,人的本质并非固定实体,而是在生命与精神的张力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2]。普莱斯纳以“离心定位”概念界定人的存在方式。他指出,动物的存在是“向心的”,其生命活动与自然存在直接同一,无法跳出自身位置反观自身;而人具有先天的“离心性”——人既能体验自身的躯体存在,又能以自身为对象展开反思,始终处于“在自身之中”又“在自身之外”的张力结构中。这种离心定位决定了人没有固定本质,必须通过持续的自我超越与文化创造确证自身存在^[3]。盖伦则从生物人类学维度出发,提出“人是未特定化的存在者”。与动物器官的高度特化、精准适配特定环境不同,人的器官在自然进化中并未完成特化,缺乏应对自然环境的先天本能,因此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匮乏的存在”。为弥补先天不足,人必须通过创造文化与技术建构“第二自然”,将自身能力外化到技术物之中,通过文化系统规范自身行为。在盖伦看来,技术与文化并非人的外在工具,而是人的本质的延伸与实现,是人得以在世界中持存的根本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哲学人类学的思想资源来回应甚至融入后人类的议题,从而推动了自身的理论重构。首先,哲学人类学对“技术”的根本性定位,使其能够与后人类的技术讨论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盖伦的“未完成的人”理论,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人与

技术之间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这与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遥相呼应。在这一过程中,其研究也融入了技术人类学思想与理论,如在人与技术复合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代,不应割裂人与技术的联系,而是要将人与技术视为复合整体进行研究;其次,在分析时不应单独抽离出技术,而是应该分析技术所依存的背景语境;再次,技术活动不应被视为只包含需求、功能等效用环节的活动,象征、风格等非效用的环节也是技术活动的重要部分;最后,对技术进行分析时应采取深度描写,要区分同样的技术细节在不同的对象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4]。总体而言,传统哲学人类学突破了“人是理性动物”的本质主义定义,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开放性、生成性与未完成性,技术与文化是人的存在的构成性要素。这些思想理论虽然诞生于工业时代,但其对人与技术、自然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洞察,为我们理解今日的后人类议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2 技术、文化与人的存在方式重构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以机器为动力基础的、形式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体,“现代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所有先前技术的东西,因为它是建立在一门精确科学即现代物理学之上的”^[5]。后人类时代的技术革命与文化转型,正在从身体、意义到整体存在形态的层面,对人的存在方式进行全方位重构。这种重构并非技术对人的单向改造,而是技术、文化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双向互动,最终塑造出全新的后人类存在形态。一方面,生物技术实现了对身体的深度改造。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对人类基因组进行精准修饰,从根源上改变人的生物性状,不仅可以治愈遗传疾病,更能够实现身高、智力、体能等性状的增强。这种对身体的“源头改造”,打破了自然身体的给定性,使人的生物属性从“自然产物”转变为“技术产品”。对此也有学者构建“权力—技术—文化”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数字记忆的深层建构逻辑与机制。研究以福柯权力理论、可供性理论和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揭示权力如何通过资源配置、规范设定与话语塑造,主导数字记忆的治理过程;技术如何以功能性、参与性与体验性三种可供性塑造记忆的呈现与互动方式;文化如何以强化认同、历史见证与知识转化为诉求^[6]。

从哲学人类学视角看,人天生就不具备固定的身体形态与功能边界,技术只是为人的身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拓展了人的存在边界,而文化是人的存在的意义维度,哲学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人的“第二自然”,是人建构意义、规范自身的核心场域。后人类时代,数字技术全面渗透文

化生产与传播全过程,推动文化形态从工业时代的印刷文化转向数字时代的数智文化、虚拟文化,人的意义世界也随之发生深刻转型。

首先,文化生产主体的泛化与去中心化。传统文化生产以专业创作者为核心,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明确的主体性与人文内涵;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崛起,使得机器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主体,算法能够根据数据自动生成文本、图像、音乐乃至影视内容。文化生产不再是人类独有的精神创造活动,而是演变为人机协同的生产模式,文化的人文属性被技术属性部分消解,文化产品的意义深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次,文化空间的虚拟化与身份认同的流动化。元宇宙等数字空间的建构,为文化实践提供了全新场域。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艺术创作、社交互动、仪式实践,形成与物理空间平行的数字文化生态。

3 后人类时代下人、技术与文化共生的溯源与反思

当下人类已然步入“数字人类世”,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深度介入各类文化生产实践。依托这一时代图景,“以技术赋能文化”成为跨越国界、获得广泛认同的主流舆论与发展叙事。这套话语体系赋予技术高度正向的价值定位:视其为驱动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助推文旅文创产业迭代升级的关键抓手,更是弥合公共文化资源差距、实现普惠均等服务的重要载体。其内在逻辑清晰分明:将技术定义为化解文化发展各类难题的可行路径,把各类文化资源、文化空间视作等待数字化挖掘与活化的载体;预设技术具备主动驱动、赋能改造的主体属性,而文化则处于承接红利、被动接受改造的客体位置^[7]。

后人类时代人、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并非技术发展带来的全新突变,而是人与技术、文化本性共生关系的历史延续与极致展开。以哲学人类学视角追溯其存在论根源,审思其现实困境,才能找到应对后人类挑战的合理路径,去揭示了人与技术、文化之间并非外在的工具性关系,而是本源性共生关系。这种共生性根植于人的存在的未特定化,是人生存的本质要求。

从存在论层面看,人天生就是“技术-文化的存在者”。因此,技术与文化不是人的身外之物,而是人的存在的构成性要素,没有技术与文化,就没有人的现实存在。从人类诞生之初的石器工具与原始图腾,到农耕时代的铁器与礼乐文化,再到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与现代文化,技术与文化始终与人的存在相伴相生,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

的演进。进化维度看,人与技术、文化是共同进化的。人类的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文化进化并非相互独立的过程,而是处于双向互动的协同进化之中。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进而影响人类的生物进化方向;文化的演进塑造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与行为规范,成为人类进化的“软基因”。换言之,人类认知与能力的提升,又推动着技术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后人类时代的技术革命,本质上是这种协同进化进入了新阶段,技术从改造外部世界转向改造人自身,文化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人与技术、文化的共生从外在的功能共生,走向内在的存在共生。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人在自然中创造了超自然的世界,我和我的世界共同构建了我的生活,其中最紧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构建或创造?从技术哲学与人类学中阐释,人通过技术活动实现生活规划,制作生活本身,同时也塑造与改变着相应的文化环境。由此可见,后人类境况并非对人的存在的背离,而是人的存在的本性共生属性的必然展开。承认这种共生性,是理解后人类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前提,既不能以人本主义立场拒斥技术发展,也不能以技术决定论立场消解人的存在价值^[8]。

4 结语

后人类时代的到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引发了深刻的存在论危机。哲学人类学以其关于人的存在的生成性、开放性与共生性的深刻洞见,为我们理解后人类境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从哲学人类学视域看,后人类并非人的终结,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新形态,是人与技术、文化本性共生关系的深化与拓展。技术具身拓展了人的存在边界,数字文化重塑了人的意义世界,二者相互作用影响。面对后人类时代的挑战,我们既不能固守传统的人本主义立场盲目拒斥技术,也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消解人的价值。应当以哲学人类学的思想为根基,守护人的存在的开放性与历史性,以文化的价值理性引领技术发展,建构人、技术与文化和谐共生与良性发展的存在论格局,才能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守住人的存在的意义与尊严,开创兼具技术活力与人文温度的后人类未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舍勒. 哲学人类学[M]. 第一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 马克斯·舍勒.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 第一版. 商务印书馆, 2024.

[3] 许洪波. 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思想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21.

[4] 王皓. 技术人类学的历史、特色、纲领与价值[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 37(4): 43-48.

[5] 刘佳男, 许昊阳. 从实存到共在: 海德格尔的技术形而上学批判及其人性论重塑[J]. 西部学刊, 2026(9): 43-47+88.

[6] 李哲欣, 陈金菊, 林泽斐. 数字记忆建构: 权力、技术、文化及其协同机制研究[J]. 档案学研究, 2026(2): 109-118.

[7] 李康化. 从“技术赋能”到“文化规制”: 数字时代技术——文化关系的范式重构与文明调适[J]. 江海学刊, 2026(2): 83-91+255.

[8] 敬狄. 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路径——奥特加·加塞特如何建构面向生活的技术哲学[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 33(5): 20-25.

作者简介: 顾金桐(1998.11-), 男, 汉族, 江苏泰州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人类学与世界民族, 旅游人类学。